

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七】 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大纪元系列社论
2004年11月

<http://dajiyuan.com>
<http://dajiyuan.com/gb/nf3046.htm>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传阅和转载，不得更改)

【退出中国共产党】

大纪元设立网上签名

大纪元2004年11月18日开始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在社会上已引起巨大反响和震撼。全球大纪元编辑部连日来收到不少华人读者来信，赞赏《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冷静、客观、理性而锐利的笔锋，全面揭示了中共统治的谜底，并同时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要求刊登退出中共共产党员和中共共青团员的声明。

目前还有不少民间团体呼吁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个人要求退党的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正成为一股社会正义之潮流。

「中国和平组织」12月3日发出倡议书，呼吁广大中共党员退党。倡议书呼吁每个中共党员，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勇敢地发表公开退党的声明，彻底与中共邪恶的意识形态与暴力政权划清界线，回归为一个善良而光明磊落的自由人。

大纪元新闻网特此为读者设立「退出中国共产党」网上签名，刊登读者要求退党的声明和言论，为读者提供一个公开发达自己要求结束作为中共党员（中共共青团员）身份的场地。

人类的软弱、妥协与顺从恶化了中共带来的社会灾难，中共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人心中播下了恐惧，是中共长期的洗脑与善变，让我们丧失了敏锐的判断，让我们还在期待，还在幻想，还在漠视悲剧的延续。

中共无论如何伪装、变换，它无法摆脱其专制、控制的本质。中共惯用「党性」制约其成员。党员个体虽是其中一分子，但来源还是具有人性的人，根本就不是中共的同类。中共邪灵不断侵蚀人性，直到最后用党性(毒性)完全替代，让鲜活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

目录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前言	1
一、杀人如麻	3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9
三、党内残酷斗争	15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17
五、家庭的毁灭	18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20
结语	25

的生命变成邪体中的一个粒子了。

区分生命中被中共扭曲的部分，区分那些非人性自我的思维和意识，虽痛苦艰难，但意义非凡！今天人们要重获心灵的自由：明明白白中国人 顶天立地自由身。

<http://tuidang.dajiyuan.com>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反馈和签名电子邮件地址：
news@epochtimes.com
99tang@gmail.com

传真：805-926-4404

信箱：

Box Holder (注意安全，收信人为Box Holder, 请不要直接注明“退党”，也不要留空不填)

P.O.Box 8921
Gaithersburg, MD 20898
U.S.A

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的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

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

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时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两千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八千万，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

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

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它变好，并说它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地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唤回人对恐怖的回忆。

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它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

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象、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

26

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4、有打有拉地杀人

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从来都是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

5、「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

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截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

6、杀鸡儆猴式的杀人

迫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

24

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

3

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层，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5

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

4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三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

6

7、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

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

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结语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六千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八千万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

25

了它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它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

（二）、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

1、舆论先行

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

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

2、发动群众杀人

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的生死。

3、先杀灵魂，再杀肉体

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

23

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

4、屠杀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跳到前台杀人。

5、为掩盖消息而杀人

知情权是中共的另一个罩门，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

6、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

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一百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杀人的准备更加充分。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

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

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一）、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

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它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份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最恶部份。

中共用它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份。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

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了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

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七百七十三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七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象过去庞大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惨忍、人数越众多，才越

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祸首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好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

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一）、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

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十三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十三次钢刀，砍下了十三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

这其中包括：1、

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

2、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

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覆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

1、解决知识份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

中共长期以来多次发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份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2、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

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晗、老舍、翦伯赞等，发展到杀「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操纵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

3、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

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

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五十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

束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与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毁灭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女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

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二）、「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千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极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三）、迫害法轮功

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无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

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轮功的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百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

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以图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以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学员乳房、男学员阴茎、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电击时间长。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

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

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

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钩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

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三、党内残酷斗争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